契丹字研究概况

刘凤翥　于宝林

契丹是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之一。早在《魏书》中即有专传记载。唐代末年，契丹首领耶律阿保机统一各部，进而建立了几乎与五代和北宋相始终的契丹（有时称“辽”）王朝。

契丹王朝建立后，曾参照汉字先后创制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先声。契丹字对后来的女真字的创制也产生过影响。

关于契丹字的记载，以王溥《五代会要》（962年）为最早：“契丹本无文纪，唯刻木为信。汉人之陷番者，以隶书之半加减，撰为胡书”（卷二十九）。《新五代史》也有类似的记载，再后的《契丹国志》、《书史会要》都转引了这种说法。《辽史》则分别记述了契丹大、小字的创制经过：神册“五年春正月巳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卷二）。“回鹘使至，无能通其语者，太后谓太祖曰：‘迭剌聪敏可使’。遣逐之。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卷六十四）。

《金史》记载：“希尹乃依仿汉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国语，制女直字”（卷七十三）。可见，汉字是契丹字之“源”，女真字是其“流”。

契丹字行用于我国北方近三百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年）十二月“诏罢契丹字”（见《金史》卷九），以后遂废。明清以来，逐渐成为无人认识的死文字了。

据史书所载，契丹字通行时，曾用来撰写和翻译过很多书籍，可惜都已亡佚。今天所见除《燕北录》所录符牌上的五个契丹字之外，皆为金石铭刻。这些铭文大部分是在本世纪发现的。

著名的《郎君行记》虽早为明清金石学家所著录，但因该碑刻于金天会十二年而皆将其误认为女真字，直到1922年6月21日比利时传教士凯尔（L.Ker）在内蒙古巴林右旗白塔子附近辽庆陵首次发现辽兴宗与仁懿皇后的契丹字哀册，以及1930年汤佐荣再挖庆陵，获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字哀册，才使今人得知契丹字的真面目，用庆陵哀册与《郎》碑对照，纠正了几百年来将《郎》碑上的契丹字视为女真字的误解。

辽庆陵契丹字哀册的发现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日本岛田好称之为“洵世界之大发现”。① 著名考古学家江上波夫称之为“考古学上、历史学上、语言学上的重大发现，为东洋学上的大事件”。②

契丹文字有大、小字两种类型，这两种资料均陆续有所出土和发现。

《静安寺碑》碑阴刻有契丹大字（勉强能辨出90多字），但因世无识者，又因风化太甚，长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园田一龟在《满洲金石志稿》中，首先指出其为契丹字，山下泰藏在《满蒙》第十六年（即1935年）十号上发表了该碑局部拓本照片，遂使世人得知还有区别于庆陵哀册式的契丹字的另一种契丹字。

1939年发现契丹大字《故太师铭石记》，稻叶君山指出这是有别于庆陵哀册的另一种契丹字，但将其误认为契丹小字。1942年李文信在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三号上发表了墓志的拓本照片。所刻契丹字四十行约一千八百余字，这是契丹大字碑刻字数最多的一件，可惜原石和拓本皆不知下落，所发照片字迹不甚清楚，给辨认带来很大困难。

以上是解放前契丹字文献的出土情况。解放后，随着考古事

业的发展，契丹字文献又有新的发现。1951年夏，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萧孝忠墓志》一合，志盖背面刻汉字，志文刻契丹大字十八行，约五百字。1964年冬，辽宁省朝阳县柏树沟地方出土《耶律延宁墓志》，志文上半部刻契丹大字十九行，约二百七十字，下半部刻汉文，两者不对译。1975年冬，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沙日温都地方发现《北大王墓志》一合，志盖刻汉文，志文刻契丹大字二十七行，约七百九十字，两者不对译。中央民族学院贾敬颜先生早年在旧书店中购到契丹大字墓志拓片一份，原石出土情况及下落均不明，墓志刻契丹大字十六行约三百九十二字。另外，还有在辽太祖陵和辽上京发现的契丹大字残石和镜、钱、牌、印章等。

1950年5月在辽宁阜新县清河门出土的《萧令公墓志》（残石），刻契丹小字三十二行，现存约五百九十四字。1969年夏，内蒙古翁牛特旗毛不沟出土《故耶律氏铭石》一合，志文刻契丹小字二十五行，六百九十九字。在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萧仲恭墓志》虽然早在1942年已挖出，但长期弃置原地，无人过问。1972年运至省文管处保存。其志刻契丹小字三行九字，志文刻契丹小字五十行二千四百四十二字。1975年秋，辽宁省阜新县流井沟地方出土《许王墓志》一合，志盖刻汉字和六个契丹小字，意为“掩闭日甘露降”，志石有残缺，然四面刻字，除一面刻汉字外，三面均刻契丹小字，有六十四行，现存约二千一百六十三字。1983年出土的《耶律仁先墓志》，盖背有契丹小字七十一行，共五千余字。此外，还有《完颜通铜镜》（五行十六字）、《宝坻镜》（四字）、《圆铜镜》（七行二十八字）、《玉盏》（二行十一个原字）、《鱼符》（五字）、《铜币》（四字）、《笔洗墨书》（可辨者七字）、《木槨壁墨书》（约二十二字）、《白塔题字》（可辨者五十余字）、《辽陵壁画题字》（可辨出五十余字）、内蒙古科右中旗巴拉哈达山洞契丹字墨书（可辨

者七十余字）、扎鲁特旗乌兰哈达石崖上也有一些契丹字墨书。

研究契丹字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大家都知道，《辽史》是我国二十四史中最简陋的一部，内中错误很多，特别是契丹族人名和专用名用汉字拼写时漏误不少。解读契丹字就可用第一手材料补充《辽史》的缺略。

研究契丹字对文字学和语言学有重要的意义。契丹字如能彻底解读出来，弄清大字和小字的造字方法，对我国民族古文字的比较研究无疑会起推动作用。通过契丹字的解读，弄清契丹语的构造，也会为我国北方民族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提供大量宝贵的材料，有助于探讨阿尔泰语系语言发展的历史。此外，契丹语材料对研究汉语发展史也是有用的，因为，契丹语里有不少汉语借词，研究这些借词可以同汉语的韵书互相参证，推求当时汉语音韵体系的细节。

在契丹字研究中，首先受到关注的是契丹大、小字的问题。

早在庆陵哀册出土之前，国外的布谢尔和白鸟库吉，国内的柳翼谋也曾撰文讨论过这个问题。不过，当时两种契丹字的实物均未出土，讨论未能触及到实质性问题。

庆陵哀册出土后，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加热烈，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③

羽田亨和金毓黻认为庆陵哀册上的文字为契丹小字。

王静如、陈述和厉鼎煃认为庆陵哀册上的文字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当为另一种类似回鹘字的文字。

罗福成认为庆陵哀册上的文字为契丹小字，册盖上的文字为契丹大字。这一意见后来被日本山路广明所因袭并加以发展，他认为所有单体字都是契丹大字，为此他写了《契丹大字考》一文，田村实造也接受这一意见。

产生这几种意见的背景是，当时只注意到一种契丹字，即庆陵哀册上的文字，而静安寺碑阴的契丹字却因字迹漫漶，没有引起

人们的注意。

自从西孤山出土的《萧孝忠墓志》发表后，讨论趋向深入，争论的中心是庆陵哀册式和西孤山式契丹字哪种是大字，哪种是小字。金光平、曾毅公首先提出西孤山式为大字，庆陵哀册式为小字的见解。阎万章持相反的意见，金、曾二同志的意见陆续得到王静如、陈述和厉鼎煃等人的赞同。阎万章的意见则被《中国古代北方民族简史》、《中国通史》第六册和《中国古代史》下册等书所采纳。

我们支持金、曾二同志的意见。

据《辽史》卷六十四皇子表所载，契丹小字有“数少而该贯”的特点。从《郑恪墓志》中称墓主人“识小简字”，得知契丹小字有“简”的特点，契丹小字的特点是与契丹大字比较而言的。我们就从这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一问题。

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字最小读写单位是原字，长田夏树据四个哀册和《郎君行记》等五件资料统计，契丹原字有三百二十七个之多。后来，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统计时，增加了《萧仲恭墓志》、《许王墓志》和《故耶律氏铭石》等新出土的资料，统计出的原字字形有三百七十七个，其中有一些是异体字，实际字数约三百五十个左右。资料增多了两倍，可是原字的字数增加有限。可以预计，今后就是再增加多少新资料，原字的字数也不会增加很多。

至于西孤山的契丹字，王晴同志仅据现有资料初步统计就有一千四百六十二个之多。

“数少而该贯”正是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字的特点。原字数量虽然少，但由于是拼音文字，可以用为数不多的的原字拼出无数的单词，作到包括一切、贯通一切。

所谓“简”，是指笔划简单，用起来简便。据现有资料统计，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字的基本书写单位——原字，笔划最多的是

十划，这个原字也仅在手抄本《仁懿哀册》中出现过一次，其余原字一般均在五划左右。这与西孤山契丹字的基本书写单位相比，笔划显然少得多。基本书写符号少，掌握起来就容易，运用起来就简便。因此，我们认为西孤山式为大字，庆陵哀册式为小字。

不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当前研究的重点应是认字，即考释字义和推求读音。

契丹大字由于资料较少，不是拼音字，解读难度更大。阎万章同志在《考古学报》1957年第二期上发表的《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一文是第一篇关于契丹大字的研究性文章。他在文章中采用汉文志盖和契丹字志文对比，以及契丹大字和女真字对比的办法，考释出义为“重熙”、“大安”、“咸雍”、“统和”等契丹大字年号，还考释出义为“年”、“月”、“日”、“木龙”、“马”、“猴”等一些契丹大字。这些释读经后来的检验大部是站得住的。另外，他在文章提出，契丹人用五行代十干，用十二兽代十二支，这些意见与山路广明和爱宕松男的意见不谋而合，这一见解，不仅对契丹大字，就是对契丹小字的解读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国外，直至1963年，日本丰田五郎才发表了一篇题为《契丹隶字考》的研究契丹大字的文章，这是一篇与阎万章商榷的文章，由于丰田五郎没能见到契丹字的原石和拓片，转写有误，因而影响到他的结论和准确性。

1979年《民族语文》发表了刘凤翥《关于混入汉字中的契丹大字“纥”的读音》一文。文章根据新出土的《北大王墓志》除对此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外，还读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开泰”、“太平”等年号和“辛”、“酉”、“蛇”、“元”等字。接着作者在该刊1982年第3期上发表了《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一文，对现有资料中有关纪年部分进行了探讨。

这就是迄今为止对契丹大字的研究状况。

至于契丹小字的研究，比起契丹大字来深入得多。目前，所说对契丹字的研究主要是指小字。综观近半个世纪的契丹字研究史，大体可以看出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或者说是三个高潮。

我国学者是契丹文字研究的开拓者。契丹文字研究第一阶段始于三十年代初，在这个阶段，代表人物是我国学者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等，他们所用的方法可以称之为“比较法”，即把契丹字哀册册盖与册文相比较，把汉字哀册和契丹字哀册相比较，把各个契丹字哀册相比较，把契丹字哀册与《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相比较，把契丹字哀册与历史记载中的有关契丹语单词相比较，等等。通过这样的反复比较，从而释出了一部分契丹小字的年号、干支、数目字以及相当于年、月、日、皇帝、皇后、哀册文等意义的契丹小字。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每个研究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大体一致，虽分头进行研究，然而所获成果多不谋而合。这些成果经多年解读实践的检验，大都确实可靠，为以后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这一阶段的缺欠是释读偏重语义，结合语音进行探讨不够，对契丹语的语法关系也未引起充分注意。

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是1934年4月出版的《辽陵石刻集录》。该书为金毓黻编著，共六卷。卷一是金氏写的绪言，这实际是一篇研究文章，虽未涉及解读，但对契丹文字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并对契丹与达斡尔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绪言，还最先提出庆陵哀册上的契丹字为小字的看法。该书卷二收录了契丹字和汉字的辽庆陵帝后哀册的拓本和抄本，以及《郎君行记》和《贾师训墓志》拓本共二十件。卷三是罗振玉为汉文哀册写的跋尾。卷四为罗福成对契丹字哀册的考释。卷五收录了一些小件的契丹字资料，如铜镜拓本、玉盏摹本、鱼符拓本等。卷六收

集了当时有影响的契丹字研究文章九篇。此书由于收集资料较全，又印刷精良，因而，成为中外契丹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

整个四十年代，虽然也有讨论契丹字的文章，例如：李文信的《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冯家升《关于契丹碑铭》、朱子方《契丹大小字创制之年代问题》、山路广明《契丹大字考》等，但文章数量不多，文章的内容也未涉及契丹字的解读，因而显得不活跃。

1951年3月，日本村山七郎在《言语研究》十七、十八合刊号上发表了《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一文，打破了近十年的沉寂。这篇文章另辟蹊径，对契丹文字进行解读，因而引起学界广泛的兴趣。以此为契机，日本东洋学界出现了一阵不小的契丹字热，它标志着对契丹小字的研究进入了一个以探索其读音为主要方向的新阶段，开始了第二个研究高潮。这个高潮持续到六十年代初。

在这个阶段中，日本的主要研究者除村山七郎外，有长田夏树、山路广明、爱宕松男、田村实造、小林行雄等。苏联有鲁多夫，达斯金、沙夫库诺夫等。在这个阶段中，我国虽然也发表了厉鼎煃等人的一些研究文章，但影响较小，总的来看，研究中心在国外。

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开始用近代语言学的方法（特别是语音学的分析方法）和统计学的方法来研究契丹字。重点是推求契丹字的音值。因每个研究者的具体方法不同而形成许多解读派别，每人所得的结论相差很大，这也是与第一阶段不同的。

村山七郎提倡的契丹原字仿突厥字说，是在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的前提下，首先比照蒙古语来推求契丹原字的发音，之后，再到突厥字母中去寻找与契丹原字字音、字形相近的字母，从而得出契丹原字来源于突厥字的结论。

村山七郎的这种解读方法，在当时引起了相当的反响。田村

实造将其喻为“哥伦布使鸡蛋立起来”。而山路广明、长田夏树则提出异议。实践证明，村山七郎的这种方法是行不通的。然而，这个观点，在当前日本学术界和我国学术界部还有人支持和沿用。

爱宕松男也是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起来。他把每个原字分割为几部分，给每个分割出来的部分构拟读音，如果构拟的音与蒙古语不合，就采用增减音素的办法加以平衡。例如：契丹小字中“四”是由一个原字“乞”构成的。他先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蒙古语“四”音dorben。于是，他把此字分割为“一”和“七”两部分，上半部音d，下半部音en，二者相拼为den，然后把蒙古语“四”中orb去掉，成为d(orb)en。

从今天解读的情况来看，我们说村山七郎和爱宕松男的确拟对了一些字音，那是因为在契丹语中有部分词发音与蒙古语相同或相近，我们认为，他们的失误在于不应将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因为契丹语与蒙古语并不完全相同。当遇到二者发音不同的词时，他们就拟错了音。我们说，即便是遇上二者发音相同的词汇，也还需其它的证明才能确立。而这些必要的旁证，他们都缺乏。因而，他们即便拟对了一些音也并不等于说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严密的。

长田夏树是用统计学的方法来探讨契丹原字的音值。他统计了契丹字和《元朝秘史》中各音素出现的频率，然后，互相参照进行拟音。统计法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长田夏树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然而，他运用统计法过于刻板，若在构拟音值时，再与其它方法相配合，效果还能更好。

山路广明发表的契丹文字研究文章最多，比较起来，成绩也最大。他认为契丹字是改造汉字字形而成的。契丹字的原字源出汉字，再参考回鹘字的拼音法，缀合而成。我们看到，在契丹语中，确实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汉语借词，例如：“皇帝”、“太后”

等，对于这些词，他的拟音，无疑是正确的，可惜的是，他的结论从多方印证上下功夫不够。

苏联鲁多夫、达斯金、沙夫库诺夫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都发表在1963年。鲁多夫的文章除对契丹文字进行了一般介绍外，对十几个原字推定了音值。达斯金也是采用将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的办法构拟音值。沙夫库诺夫则侧重把一些契丹字当做汉语借词来解读。

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成就是构拟契丹原字的音值。据我们检验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原字音值有三、四十个之多。

还需要提及的是1953年出版的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合著的《庆陵》一书。这部著作，可以视为这个时期研究契丹字繁荣景象的象征。本书作者在早年曾数次赴庆陵考查。书中从考古的角度，收录了不少契丹字原始资料，如壁画上的文字。该书印刷精良，装成二巨册，曾获日本学士院恩赐奖。

从1963年到1973年十年间，虽然，也有苏联斯达里科夫等人的一些有关契丹字著作，但偏重于资料或索引，在研究上没有什么进展。这些年中，日本的研究也呈停滞状态。从田村实造1976年发表的文章来看，可以说基本没有进展。契丹文字研究，再次进入低潮。

1973年下半年，我国相继发表了陈述、郑绍宗、王静如等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197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联合组成了“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小组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契丹字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研究小组对契丹小字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类，初步确定了三百七十八个原字的字形(其中有些是异体字)。

研究小组总结了以往学者的经验，从契丹字中的汉语借词入手，选取了《郎君行记》作为突破口，结合其它资料进行综合研究。

《郎君行记》碑前面刻契丹小字，后面刻汉字，在汉字部分的最后一行写明“右译前言”，因此可知这块碑所刻契丹、汉两种文字是对译的。《郎君行记》的汉文部分记载了一些人名、地名，而与此相对的契丹字应是音译。契丹小字是拼音文字，只要找出音译汉字的契丹小字，将其分解成原字，再用其它音译词中的同一原字进行印证，就可构拟出一个大致的音值。研究小组还发现，不少契丹字的职官名也是音译汉语的。于是译出了一批契丹小字的职官名称。在这个基础上又解读出一些契丹本民族语言的单词，并发现契丹语有元音和谐律。这样，连同经过检验的前人成果在内，共构拟出一百四十多个原字的音值（约占原字总数的三分之一），解读出三百多条词语和分析了几十种语法成分。

研究小组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应看到，所使用的方法也有其局限性，契丹语中的汉语借词毕竟是少数，而大量的固有词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近年来，发表研究契丹文字文章的还有胡振华、沈汇、高路加、黄振华、贾敬颜、即实、王睛、苏赫、阎万章等。一个新的研究热潮正方兴未艾。

注　释

① 见《林西辽陵石刻出土记事》，载《书香》第46期，1933年1月。

② 见《东亚考古学》，平凡社，1939年9月。

③ 朱子方还曾在1946年探讨过“契丹大小字创制的年代问题”，见《东方杂志》42卷12号。

略论《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

于　宝　林

在契丹字研究中，有一种学说，主张依据蒙古语音、比照突厥字母来解读契丹字，我们可将之称为“契丹字仿突厥字母”说。这个学说至今在日本尚有影响。在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中也有人沿用这个方法。

这个学说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村山七郎。其代表作是《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以下简称《方法》）。①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的日本学术界曾引起过强烈的反响。

对于这篇文章，有人推崇备至，有人提出疑义。日本著名东洋史专家田村实造对该文大加赞扬，他说：“关于契丹文字，有很多学者长年累月致力研究，但迄于今，尚未能发现解读的钥匙，由于村山七郎氏的天才涣发和不屈不挠的努力而解读成功。”② 他又说：“由于村山七郎在日本语言学会的机关刊物《言语研究》（十七、十八合刊号）上发表了《契丹文字的解读方法》一文，终于成功地解决了多年的疑难问题。……象这样的成功，不能不说是由于我们的少壮学者努力带来的，是值得我们在全世界夸耀的。”③ 他还把这篇文章喻为“哥伦布使鸡蛋立起来。”④ 但长田夏树、山路广明则提出不同的看法。长田夏树说：“村山氏的研究，最突出的结果是把契丹字与突厥字结合起来加以说明……结果达到了不合理的结论，对这种做法，我不能全部同意。”⑤ 山路广明说：“日本有些学者，立‘契丹小字直接由突厥文字所制作’之说，我认为这是误解。”⑥